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  
• 大学之道丛书 •



KNOWLEDGE AND MONEY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  
**大学与市场的悖论**

[美] 罗杰·盖格 (Roger L. Geiger) 著  
郭建如 马林霞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30159

G649.712

121



KNOWLEDGE AND MONEY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

# 大学与市场的悖论

[美] 罗杰·盖格 (Roger L. Geiger) 著  
郭建如 马林霞 等译



北航

C1635934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G649.712  
12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与市场的悖论/(美)罗杰·盖格(Geiger, R. L.)著;郭建如,马林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

ISBN 978-7-301-15950-7

I. ①大… II. ①盖…②郭…③马… III. ①高等学校—教学研究—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7029 号

Roger L. Geiger.

Knowledge and Money: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  
© 2004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书 名: 大学与市场的悖论

著作责任者: [美]罗杰·盖格 著 郭建如 马林霞 等译

责任编辑: 刘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950-7/G · 26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up@pup.cn](mailto:z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 版 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8.5 印张 300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导　　言



美国研究型大学迈入 21 世纪时,正处于史上最强的状态。<sup>①</sup> 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和高级研究人员在此寻找机会分享学识。总的说来,科学家们将这些机构视为进行研究的最好场所。美国最有能力的高中毕业生倾向于在这些高校进行本科学习。捐赠者以更多的馈赠表达着他们的赏识。大学谨慎而成功地使自身对美国社会更有用处,并把作为“后工业社会中轴机构”这一有些预言性的称号正当化。<sup>②</sup>

像人们可能会怀疑的那样,这些不可否认的标志性成就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在可能是“做得越好,感觉越糟”的典型情境中,大学似乎处于很多批评家的围攻中。在艾伦·布罗姆(Allan Bloom)的《美国心灵的封闭》于 1987 年出版后,抨击大学就成为文化上的固定内容。国会的立法者和各州因大学受到的一些指控而忧虑,对所谓的弊端提出它们自己的草率的补救办法。而且,一个为国家高等教育机构改善运行和提高效率提供药方的小产业也发展起来了。

这本书以大学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以及——相应的——社会需求和条件如何塑造大学的特征为基础,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评论。它预设

---

<sup>①</sup> 美国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拥有将近 4000 所高校和 1500 万学生。不加区分地对整个系统发表评论是没有意义的。本研究的主题是研究型大学——这些高校大多专注于通过科研和学术进行知识生产,开展博士教育和本科教学。为了追踪这些高校的发展,我收集了附录中所列的 99 所高校的信息。选取标准兼顾了学术实力和科研活动,这些高校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关键部分,它们承担了将近 75% 的学术研究,授予 28% 的学士学位、34% 的第一级专业学位和 68% 的博士学位。

<sup>②</sup>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这一观点被包括 Clark Kerr 和 Harold Perkin 在内的许多社会理论家引用过。



了一个超越教学、科研和服务等特定功能的大学概念,这些功能以及大学的独有角色是以大学在生产和传播高深的专门知识中所处的特权位置为基础的。当代的美国大学在其广泛的活动中,实际上是一种知识聚集体,而维持这一角色的代价很高昂。例如,本研究关注的 99 所大学,它们的开支占到美国经济的 1%。大学对获得如此庞大资源的需求,已在事实上对其行为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并非历来如此。欧洲大学在传统上是由国家给予充裕的支持,以培育和传授学识。“二战”前,私人赞助者以相似方式资助美国大学,尽管这种方式要更不稳定些。欧洲和美国的高校在规模上比较适中:毕业生是数量较少的“精英”。同样的默认传统在管理着人力资源。学生很少是招来的,而是遵循着从中学到大学这个已很牢固地确立起来的路径进入的;教授们普遍是在他们所属院校(home institutions)接受的训练。大学用绝对的、规范的术语规定它们的工作,对与其他类型的机构进行竞争或彼此进行竞争的任何建议都深恶痛绝。

在美国,1945 年以后,这种状况在一些关键方面发生了变化。联邦政府开始承担学术研究资助的更大份额。大学认为这种支持已被增进知识的内在价值正当化,但是,政府机构提供这些资金主要是为了促进它们自己的使命。不同的目的并没有阻止这种极其富有成效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发展,但每当考虑到政策议题时,潜在的张力就会浮出水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研究因为大量地与外部目标关联着,所获得的支持在稳定增长。大学必须适应赞助人的利益以获得研究资助,它们在这样做时,也在彼此竞争。人力资源领域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高等教育的大扩张导致更为明显的任务分化。对大学而言,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招收最有能力的学生成为一种挑战。对教师和研究者来讲,也是一样。一所大学作为教育机构以及作为知识聚集体的成功,开始依赖于它对稀缺的、至关重要的投入要素的竞争能力。

尽管这些发展变化有其很深的根源,但它们现在的特征却主要是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形成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高等教育渴望联邦政府能恢复其 20 世纪 60 年代的慷慨资助。只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因为一些我们将要考察的原因,根本性的重新定位开始了。大学接受了对经济做贡献的使命,特别是通过与私营产业

建立联系的方式进行。它们对其主要产品——本科教育的定价和销售进行大量修订，并改变它们的劳动投入，尤其是对教师的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实践成为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的新的现实。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如火如荼的经济中，这些取向为那些最有能力利用它们的院校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繁荣景象。市场——确实是有许多不同的市场——总体上讲，在这一点上对大学是很慷慨的，但是产生了什么样的最终效果呢？

市场对当代大学根本性的知识任务实现的影响是本研究的主题。有关这一广泛主题的许多论述相当零散，且通常持消极论调。市场通常是与创收、提高学费或者是获得教师的发明专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大学所在的一些最重要的竞争市场，是那些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的市场。如今，大学依赖市场寻求对其实现核心知识任务而言必不可少的资源，智力和财力资源的互动对它的生存至关紧要。但是，依赖市场意味着什么呢？

查尔斯·林德布罗姆(Charles E. Lindholm)写道：“市场体系是通过参与者相互调整而不是经由集权协调者的一种社会协调方式。”因此，它对提升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有两个重要的要求。第一，“市场体系能广泛地、常规性地实现大体上是有效率的定价”，并且“有效率的定价……允许大幅度地改善有效选择”。第二，“得到有效定价信息的参与者有着强烈的激励采取行动，这样做，就会获得特定的‘或有收益’(contingent benefits)”。于是，反映内在价值的定价和基于信息的行动动机支撑了市场协作产生的相互调整的自发行动。<sup>①</sup>

这与高等教育有何关系呢？对整体社会而言，教育产出是至关重要的关注点，教育因而具有很高程度的集权协调(central coordination)。高等教育的定价是更武断而非有效率的，价格只是部分地引导参与者追求或有收益。因此，高等教育市场即使不是完全不同寻常的，也是相当不完善的。尽管如此，参照林德布罗姆的社会协调的基本要素——相互调整、定价及动机，它们也可以被更好地理解。甚至是在非常不完善的市场，这些要素在当代也能产生出日益塑造着大学的市场力量。

<sup>①</sup> Charls E. Lindblom, *The Market System: What It Is, How It Works, and What to Make of I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引文见 pp. 23, 141, 142, 143。

具体而言,市场力量的日益盛行将会引起高等教育运行方式的变化。首先,集权协调在某种程度上被市场形式的协调所替代。其次,价格影响参与者选择的作用日益增强。最后,在更大程度上,那些源自高等教育的或有收益将决定个人动机。这一视角形成了关于美国大学深度卷入市场的可能后果的一些初步概念。这些特别关注在最后一章中会被再次提及,这些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会得到更深入的探究。

第一章为随后的主题打下了基础。大学与众不同的特征被描述为源于它们的创造、加工并传播知识的目的。这些内在的本质上的事务引起了两种有着松散联系的情形:一种与本科教育质量有关,另一种与学术和研究声望有关。接下来,这一章描述了市场力量如何冲击这些过程,并以对始于1980年左右的私有化时代的界定而结束。

接下来的四章构成这一研究的主体。每一章都是通过将其主题放入广阔的背景中开始的,包括自1980年以来的重要发展。

第二章从竞争卓越和竞争资源的视角出发,处理大学成本的上升问题。私立大学娴熟地使用联邦和院校的财政资助,建立起逐步升高中学费标价并使收入最优化的差异收费系统。公立大学只能部分地遵循这一高学费/高资助方案。当代,尽管绝大多数大学已增加了收入,但公立、私立大学之间出现了鸿沟。大学应对财政挑战的某些战略被认为是大学成本上升的根源。

本科教育依然是美国大学的最重要任务。不过,高校的地位竞争已经使招生的选拔性比卓越的教学更引人关注。受忽视本科生的批评及基于选拔性的糟糕的排名的刺激,公立大学不得不改善它们的形象,并更有力地竞争一流学生。不过,“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的纪录是令人疑惑的:加强对有能力学生的竞争为本科教育带来了一些改善,但也极大地助长了学生的消费主义,削弱了大学对学生学习的控制。

尽管有着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担忧,学术研究还是在当代强劲地发展起来了。第四章的相关内容显示,学术的扩张远不仅仅限于学生或教师。要理解这些发展,不仅需要检视由学术系教师构成的学术核心(academic core),也需要检视医学院和独立组织的研究机构(organized research units)的独立研究角色。在公立大学,雄厚的财力是与核心研究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但在私立大学,财力并不必然用于研究

的扩张。不过,对研究的态度是多变的。在世纪之交,大学给予推进研究的使命以更高的优先性。

支持学术研究的关键因素是它与经济发展的联系。第五章综述了大量有关大学与产业及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资料,详细地说明了大学研究在增强产业研究中所担当的传统的、无可争议的角色。当代的公共政策鼓励大学发挥这一角色,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生物技术出现了不同的范式,鼓励学术研究通过申请专利及创办企业直接进行商业化。本章分析了驱动这些发展的力量,以便评估对学术规范和可能的对于大学诚信的威胁。在可接受的限度内,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对学术研究持续的生命力而言是种激励。

最后一章试图在更为深入的一般层次上解释在这四个领域内起作用的驱动力。毫无疑问,借助于市场的社会协调形式在当代发展起来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和大学的领导者影响事态的能力被削弱。像别处一样,作用于大学的市场协调已造成更大的财力不平等,也加剧了高质量院校中学生的社会分层。它在最初建立了看似无法持续的高学费与基于需求的财政补助体系,现在已开始用竞争性的、基于学绩的补助来削弱它。生物技术产生了超出学术控制的商业化过程。尽管如此,总体上,美国大学投身于市场后,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学生以及增进知识的更大能力。大学的这些收益与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的对比,产生了市场悖论。

# 目 录



第一章 大学——以知识为基础的机构 .....	1
第二章 大学的成本 .....	21
第三章 大学的本科生教育 .....	71
第四章 大学的学术研究 .....	133
第五章 大学、产业和经济发展 .....	183
第六章 大学与市场的悖论 .....	240
附录 A 1980、1990、2000 年全日制当量学生的生均成本 .....	274
附录 B 1980、1990、2000 年部分大学的科研份额 .....	278
译后记 .....	282

# 第一章 大学——以知识为基础的机构



21世纪的美国大学是一类特色鲜明的组织，在结构上分成若干彼此独立的部分(*compartmentalization*)以执行多重功能，这些功能大多建立在大学对专业性、专门性和理论性的知识拥有唯一资格这一基础上。<sup>①</sup>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主要因他们在已划定边界的知识领域拥有专长而受到尊重，这些领域有其固有的专门性和深奥性。与其他的专业知识截然不同，学术知识追求普遍性，即有着不可避免地寻求理论的倾向。事实上，现代大学首先是这类知识的宝库。大学确实是将知识储存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研究所中，不过，最重要的知识是储存在教师和专业人员的专长中。

大学最重要的规范是寻求曾被称为真理(*truth*)的东西，尽管相对主义风行于某些领域，许多学者回避这个词。对这个规范更为中立的陈述可以是“通过系统的探究，建立有效的知识”。学术性学科或其他组织化形式的共识界定了何种形式的探究(*inquiry*)是合法的，何种知识因此而被承认是有效的。

大学的绝大多数活动源于这个学术知识的根基，如培育新手或羽毛未丰的专家、扩展知识前沿、应用知识于实践，或在学术界内外传播知识。在这个基本体系中，尚有许多没有处理的细节。长期以来，大学一直涉足于诸如表演艺术或体育这些明显是辅助性的活动，但这些领域也需要求助于专门知识，并不断努力扩展和提升表达或表演的可能性。学术知识的核心构成了大学大部分活动的基础。

---

<sup>①</sup> Burton R. Clark,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3), Chapter 1.



以知识为中心的组织通常给予专业雇员大量的自主和自由裁量权。软件企业、生物技术公司和大学大多会给予知识工作者以只有他们自己最了解的方式使用专业知识的自由。因此,本质上,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是分权性的,或用组织学的术语讲是“底部沉重”(bottom-heavy)的。大学尤其如此。在教学中对知识进行组织或在努力扩展自己的专业知识时,个体教师依赖的主要是个人的独自工作。研究是更互动性的过程,但也仍然是分权性的。为将课程和学位项目的活动进行结构化,大学教师在已被承认的知识领域的基础上,聚集成系。系进而组成学院,以便处理更大的知识领域。而最为重要的东西——也就是知识——的权威,仍是这些组织层级的根基。结果,每个单位都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更大的结构整合在本质上是共识性的(consensual)。

然而,作为整体,院校需要某些组织控制的手段。对美国大学而言,最强有力的杠杆是财政。如果说共识性权威是从组织底部向上流动的话,财政控制则是自上而下地被使用。在绝大多数的大学,教务长或学术副校长——在校长直接领导下——管理着学术机构,负责即时地监督学术事务和分配资金。教务长办公室根据大学的政策和优先事项将资金分配给各个学院。学院院长根据政策和学院的优先事项决定系的预算。而系的预算集中投在教师和职员的薪酬上。这样,如果系没有从院长那里寻求到额外资金,就很少会有主动性。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院长,他必须从教务长那里得到额外资源。管理机构对其组成部分拥有很大的财政控制权,同时允许知识工作者在他们的领域内自行其事。

这个基本结构有着许多种组合,单个大学依照某种组合自然运行。比如,那些能够形成它/他们自己收入的机构和教授,相应地就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例外证实了通则。不过,这个双重权威结构表达了大学组织的首要原理。对大学而言,这些原理有着重要的推论。

内聚(cohesion)和向内聚焦(inward focus)刻画了组成大学运行单位的各知识领域。虽聚集于一所院校,这些单位仍采用各自高度独立的结构。事实上,最早期的美国大学被描述成“依靠各组成部分的

模式化分治”而繁荣。<sup>①</sup>

大学自身提供了有关规制、服务和资源支付的总体框架，每一机构根据这一松散的框架对其运行需要进行调适。教师的工作和学生的学习——如在化学这样的实验科学、商业这样的应用领域和历史这样的人文学科——在组织上确实有差异。而且，每个机构的成员其注意力都集中于自己的事务上，对其他领域既无理解力，又无有意义的影响力。但是各部分彼此独立以执行不同功能的结构已扩展到学术机构外。例如，大多数大学感到有必要为某些类型的研究建立独立的中心或者研究所。在加州大学，这些机构长期带着“独立组织的研究机构”(organized research units)或 ORUs 的类属标签，ORUs 这个缩略词现在已被广泛地使用。事实上，大体上独立且财政通常自给的单位的增加已允许大学执行与学术有关的大量的不同的任务。

大学的多目标特征在学术机构内和跨机构间是显而易见的。知识或学识再次成为共同的分母——培育学生的学识、促进教师的学问，同时使大学的学习仓库可为社会所用。这些不同的目的被个体教师所感知，他们必须运用专业判断来平衡对学生、对研究、对内部自我管理和为外部“选民”(constituencies)服务之间的责任。教师们对这些活动的平衡，依个体倾向和能力有很大的差异。就个体的职业生涯而言，变化也很大。

大学同时也依靠特定机构去执行许多有关联的和辅助性的任务。除学术系和 ORUs 外，今天一个典型的规模较大的大学还会经营着旅馆和住宿系统、研究园区(可能与商业孵化器连在一起)、医院、大学出版社、广播台，可能还有电视台、继续教育部门以及体育娱乐综合体等。这样的院校目前都在进行着十亿美元计的运营。如果用美元测算，教学可能还占不到它们活动的一半，本科教学所占的比例可能更小。这种混合活动中的大多数活动和大学的知识核心有一些关联，但有时候这种联系很微弱。

大学以知识为中心的特征与财政控制的方式相结合，产生了另外一组后果。大学各组织层次上的机构通过获得尽可能多的财政资金，寻求将自身的活动范围最大化，同样的准则适用于作为整体的大学。

---

<sup>①</sup> Laurence Veysey, *The Emergency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 338.

著名的霍华德·鲍文(Howard Bowen)定律认为,“为了追求卓越、声望和影响……每个院校都尽其可能地筹集资金……(并)花光它所筹集的全部资金”。<sup>①</sup> 大学的院系通常以相似方式寻求扩大资金的分配。这一动机并不是出于贪婪或饕餮,而更像是慢性营养不良这样的东西。在大多数大学,学术机构在大多数时间会相信自己需要额外的财力来完成应该做或应该更好地做的工作,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绩效。

因此,学术机构是资源消费者,并在很大程度上与募集和分配资金的组织经营方面分离开来。很多方法被设计出来以改变这一局面,刺激这些消费性的机构多进行生产,而不是相反——给予它们更少的资源。<sup>②</sup> 但是,这种关系仍是根本性的——这并不异乎寻常:它广泛地存在于非营利组织中。

### 非营利组织和追求知识

如果高等教育与自由市场的模型是一致的,即竞争会降低成本并获得市场出清的价格,那将是很奇怪的事情。学院和大学提供的是高度差异的产品,即便产品可以进行比较,但因它们对应的是一般的技能和文凭,竞争将不会完全基于定价。交货的快捷与方便对消费者的机会成本有着强烈的影响。针对年轻人的本科教育,特别是传统的寄宿制形式,很少有自由市场的特征。除差异化外,本科教育也是一种高度补贴性的服务,包含着第三方付费,这种服务适合被定位于公共性的和非营利性的机构。

经济学家不得不发展出不同的概念透镜(conceptual lens)来分析非营利组织。根据定义,这类组织被禁止将剩余收入(利润)分配给它们的官员或理事,而且这类组织还必须把其资产捐献出来,用于它们自己所宣称的目的。很明显,在信任是极其重要的议题的地方,如在高等教育中,这样的组织比营利性企业更可取。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

<sup>①</sup> Howard R. Bowen, *The Cost of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0), p. 20. 这一法则看似简单,实非如此:David Breneman 称之为“值得考虑的仅有的两个(关于高校成本的)基本理论之一”,见“An Essay on College Costs,”i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Study of College Costs and Prices: 1988-89 to 1997-98*, Vol. 2 (Washington, D. C.: NCES, 2001), pp. 13-20, 引文见 p. 14。鲍文法则和第二种基本理论将在第二章中进一步讨论。

<sup>②</sup> 见第二章和第六章;也见 Daniel Rodas, *Resource Allocation in Private Research University*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2001)。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导致购买者难以对服务的质与量进行评价。因为注册入学是具有高交易成本的长期承诺，消费者应该对高校不会利用它固有的优势而牟利有信心。另外，非营利形式创造了适宜的慈善目标，捐助者相信通过这种形式，馈赠将被用于他们所预设的目的。<sup>①</sup>

基于相同理由，理论上相信，公立大学也不会不公平地利用其对消费者的优势，但在这里，另外的考虑占了上风。州对帮助每位公民获得与他或她自己的能力和倾向相称的教育具有浓厚的兴趣。充分就业允诺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最大化，在这种意义上，充分教育(full education)应该对社会成员的生产率和福利的最大化做出贡献。很明显，最近几十年来，各级政府都毫无保留地依此理论而行动：建立学院并为绝大多数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机会。但是，高等教育的公共供给(public provision)受到政府及选民所认为的适当水平开支的约束。那些希望得到不同的或更昂贵的替代品的个人，很大程度上转而寻求私立非营利部门。<sup>②</sup> 绝大多数私立学院和大学宣称提供某方面的“特色”教育，一些私立学院和大学也通过充足的师资、设备和便利的生活设施(amenities)，提供被认为是更高质量的教育。这些高校绝大多数收费很高，但它们名义上的质量有许多也来自于高水平的补贴。

美国的高等教育可从许多途径获得补贴。公立学院和大学主要依靠各州的拨款，但是其他形式的公共支持，包括学生的财政资助在内，都是既提供给公立院校，也提供给私立院校的。免税是基于对公共物品的贡献，这是另一种暗补。高等教育的基建成本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采取的是几乎完全补贴的形式。

纵观美国历史，学生极少被要求为他们受教育时使用的土地和建筑付费。<sup>③</sup> 政府和私人捐助者提供了大量的基建，使得院校预算几乎只是反映直接的运行成本。最后，与世界上其他大学不同，美国大学

<sup>①</sup> Henry Hansmann, “Economic Theorie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载于 Walter W. Powell,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7-42。

<sup>②</sup> Roger L. Geiger, “Finance and Function: Voluntary Support and Diversity in America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载于 Daniel Levy, ed., *Private Choice and Public Policy in Private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sup>③</sup> 随着公立和私立大学基建贷款的增加，这种情况有所变化。由于捐赠基金的利率低而回报高，这种形式的套利一直具有吸引力，结果是学生现在要对所使用的设施付一定费用。另一个例子是，债券评级目前已成为市场中各大学的重要考虑因素。

从捐赠人的善行中得到了大量补贴。当前的馈赠(gifts)和以往馈赠的遗留作为捐赠基金保留下来,以提供大量补贴,这些补贴在不同的院校之间有着很大差异。这些补贴使高等教育能低于成本而定价,从而为充分教育和造福于社会做贡献。另一方面,有人可能会说,补贴会允许提供比绝大多数人能支付得起的教育好得多的教育。这种由补贴引起的质量差别或差距(margin)广泛地存在于从社区学院到常春藤联盟的大学之中。

任何给定院校的教学成本都可以被表示为学生为所受教育而支付的学费与附加的补贴之和。这些收入的总量合起来,大体上决定了大学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它们独特的知识任务。如果所有的高等教育服务都完全一样,并都在市场出清的价格上提供,实现这些独特任务的活动几乎都将不会存在。教学劳务将会向下出价到最小能力,辅助性的服务活动将不能持续下去,也没有办法支持知识的增进。<sup>①</sup>事实上,允许知识活动激增的界限在院校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超越假定的市场出清最小值的实际支出界限,能使那些最能使大学显出特色的条件——优质教学、学术知识的生产和多目标的共生——成为可能。

大学教师的高资历(overqualification)对作为学习场所的大学来说是基本的,这也是教育劳动力的部分独特之处。进入学术职业的门票是博士学位(Ph. D)——一种被延长的、昂贵的、狭窄的、个体化的专门训练形式。一旦受聘于大学,教师被期望着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奉献给基于自身专业知识的某种被清晰界定的任务。<sup>②</sup>院校通过支持教师的职业发展,抑制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充分使用,来支持相关的专业知识的进一步发展。

在有效率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中,能为知识增长提供最大机会的职位——高校的最大投资——将被授予最有希望对学术做出贡献的学者。事实上,会绝对依此标准对未来的教师进行精确评价。他们读研究生时所在系的声誉、博士生导师的推荐和初始奖学金都能证明候选人在该领域增进知识的潜力。受资助的身份在将博士生与学术生涯

<sup>①</sup> 事实上,这一描述适合营利性高等教育。

<sup>②</sup> Michael S. McPherson and Gordon C. Winston, "The Economics of Academic Tenure: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载于 David W. Breneman and T. I. K. Youn, eds., *Academic Labor Markets and Careers* (New York: Falmer Press, 1984), pp. 174-99。

相匹配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而那些还不是很受青睐的人也能够通过奖学金的力量进入到更多地带有培养性质的职位。

学者和位置相匹配的过程是连续的。这些学者在被考虑给予终身制之前有六年的试用期,就是期望他们能够实现某些承诺。那些把最大投资用于年轻教师的大学,期待着这些教师为了将要得到的终身教职能有大量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投资越少的地方,期望的通常也就越少。对比期望,衡量成就——相对于学术环境的富裕程度——同样过程持续贯穿于整个学术生涯。结果是,专业知识的发展远超过给那些几乎是最优秀的学生教学的最低要求。

因此,获得终身教职的和未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所了解的知识都远远超过他们在本科生课堂上传授的主要显性知识(codified knowledge)所必需的限度。大学承认确实使用了许多低资质的教师——研究生助教或兼职教师——讲授不那么高深的课程。在这种意义上,教师的高资质使他们作为本领域的专家,能在更高级的教学、服务于知识消费者和增进本领域的知识上做出更多非凡的贡献。

美国大学的这些大量活动可能是它们最容易被误解和最容易遭到批评的部分。<sup>①</sup> 这也是20世纪美国大学显著上升的基础。可能有人首先不是问它可能会如何变化,而是会问它何以被证明是有效的。事实上,教师的高资质能促成大学另外两个独特的品性,即:知识的生产和多目标的共生。

大学中的知识生产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大学绝不是发现新知的唯一场所,但是它们的角色是独特的。大学中广泛的教学戒律要求发展和维持庞大的基础知识库。教学维持了知识前沿与更为普通的学科基础之间的联结。学术的专门知识在大学里通过训练新的学者——大学的专业角色——再生产它自己。这一过程不仅产生了新一代的专家,而且也强有力地刺激着创造力,防止停滞现象的出现。在某种重要程度上,学术知识的价值吸引了它自己的资源流,从而增强了经济的与智力的初始基础。

对社会和个体来说,以知识为基础的各种各样活动存在着大量的互补性。教学、研究和应用,以大量的不可预估的方式互相增强和孕

<sup>①</sup> Burton R. Clark, "The Modern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8(1997): 241-55.

育。研究激活了应用,而应用也产生了问题,甚至是刺激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类似地,用于教学的知识的组织和综合为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反馈。当然,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就其自身而言也都会在其他的活动中努力实现的,这种做法是合适的。一所大学纯净的环境,应当是最适于追求系统的和理论性的知识。这些活动以互补的方式进行时,就实现了效率。单独而言,这三种活动彼此渗透,同时进行。而且,具有高度专门化知识的个体在不同类型活动的联合方式中,能够比进行单一的活动——例如研究或者教学——在运用其专业知识上有更高的生产率,直至收益递减。

具有教师身份的学者拥有的精深的专业知识、知识库的内在价值和多种知识任务的互补,一起构成了美国大学的理想典范。然而,这种典范的本质——即:它对稀缺资源的要求——意味着它只能被相对较少的高校所接近。结果,大学系统内地形成了等级制,它部分地是基于院校实现这些知识任务的能力。

### 声望的双重结构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具有内在的等级性,等级化的方式反映出远比国家对排行的热情更多的东西。与欧洲大陆的体系不同,那里的政府受到约束,要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大学。美国的体系则是通过学生的自由选择、联邦和各州不加协调的支持,以及私人支持的多重渠道形成的。这种投入的混合和其引起的竞争产生了高校之间广泛的差异,从而产生了自然的任务区分(segmentation)。声望,这种等级效果的主观反映,也被区分开来。然而,在院校对资源的竞争程度上,声望具有现实后果。

声望也是需要小心对待的(模糊的)一个概念。那些试图将大学的复杂行为模型化的人,有时候会假定院校的行为意图是声望最大化。<sup>①</sup>事实上,这个观念具有误导性。大学致力于聘用可能聘请到的最好教师,支付它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薪水;同时,招收最合格的学生,提供它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就本质上必须要玩这场游戏而言,大学握有一些牌。大学大部分的能量用在日常事务上,这其中的大部分是利

<sup>①</sup> David A. Garvin, *The Economics of University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pp. 22-24.